

论《我是克隆人》中的伦理混乱与伦理选择

郭 雯

内容摘要：克隆人科幻小说作为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描写了科学对人的改造及对社会的影响。小说《我是克隆人》（*Blueprint*，又译《蓝图》）通过克隆儿丝丽伊对“母双”伊丽丝自我克隆的控诉，为我们书写了一部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伦理启示录。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围绕生物性选择之颠覆及伦理身份诉求的伦理主线，通过解构新型的伦理环境、丝丽伊对自我存在的疑惑、对双重生活的不满、对“母双”命令的违抗以及乱伦禁忌等伦理结，剖析作品深处的伦理寓意：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科学选择必将引发伦理混乱与道德失衡，克隆人小说的预见性与警示性值得人类对现实与未来的科学选择进行理性思考。

关键词：《我是克隆人》 生物性选择 伦理身份 伦理混乱 科学选择

作者简介：郭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Title The Ethical Confusion and Choices in *Blueprint*

Abstract Science fiction on human cloning keeps in pac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human change by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impact on society. In *Blueprint*, through the accusation of the cloned child of her “mother twin”, it provides us with an ethical revel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natural human and cloned hu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per centers around the ethical line of the subversion of biological choice and the pursuit of ethical identity, deconstructing the ethical knots of new ethical environment, confusion of self-existence, dissatisfaction of double life, the rebellion of mother-twin’s orders and incest taboo.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deeper ethical meaning, that is any scientific choice beyond the bottom line of cognition will arouse ethical chaos and moral imbalance, thus we need to rethink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cientific choice by the prediction and warning of the fiction.

Key Words *Blueprint*; biolog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onfusion; scientific choice

Author Guo Wen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215000,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ainna520@163.com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分子生物技术、基因遗传工程等重大突破标志着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这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类的主体性逐渐变得模糊。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文化理论家堂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曾将“赛博格”(Cyborg) 这个词融入到后现代科技革命中，论述它对人类的影响。她认为，随着“电子人”、“机器人”、“克隆人”等拥有长寿、情感和思维的“后人类”的出现，人类将重构已有的秩序¹。日裔美国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F. 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描写了生物技术充斥着“后人类”时代中种种“人”的问题和忧虑，包括尊严、人权、人性等，提出控制基因技术的政策²。《我是克隆人》(*Blueprint*, 2000) 是德国女作家夏洛特·克纳 (Charlotte Kerner) 的代表作，曾于2000年获得德国优秀少年文学奖。小说讲述了天赋极高的女作曲家伊丽丝患了绝症，为了使自己的天才在这个世界上延续，她决定克隆自己做女儿。但是“复制品”并未与她和平共处，她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冲突和心理差异，悲剧接连发生。克隆术将对人和世界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人类现有的伦理秩序、情感道德、宗教、法律等是否会随之颠覆？这些问题正是由这部小说反映出来。本文将在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新型伦理境况中，分析新型家庭模式里的克隆人如何进行身份诉求和伦理选择，并由此探讨克隆人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新型的家庭模式：血亲关系的颠覆

“克隆是英语 clone 或 cloning 的音译，起源于希腊文 klone，原意为‘用嫩枝插条繁殖’。1903年被引入园艺学，以后逐渐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高兆明，孙慕义 1）。伊丽丝在三十岁的时候，检查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为了让自己的天才永生，她决定克隆一个完整的自己。伊丽丝的愿望在医生费希尔的帮助下得以实现，成为首次实验性尝试的成功范例。费希尔提取伊丽丝的细胞克隆出一个与她一模一样而富有才华的女儿，并象征性地取名为丝丽伊。作为“复制人”，丝丽伊的生活在未出世前就已定制，唯一的使命就是延续伊丽丝的才华。

“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克隆仿佛是一股高潮般的转折点，带领我们进入后人类时代” (Ferreira 2)。丝丽伊的诞生印证了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新时代的到来。丝丽伊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具备良好的遗传基因，而且完全排除了基因赌博，排除了任何偶然性。不会出现空白彩票的，绝对是全赢！”(10)³ 这的确是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乌托邦情景，是造物主伊丽丝和费希尔创造出的理想人生，使人的生命根据自我意愿得以延续。试想，如果人类能凭自由意志挑选最好的基因，借助高科技制造最理想的后代，那么世界将被单一的“最优秀的”人统治，人类将不再拥有不同肤色的民族，每个人都会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堂。正如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中克隆人生活的“天堂”，然而，一个由所谓的完人组成的社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在植物、动物以及最确切地说在人当中，最完美的特性就是多样性。可见，单纯的遗传信息复制技术即将为传统的人类

时代划上句号。

纵观人类科技发展历程，几乎每一次飞跃都能满足人类新的欲望和自由意志。作为母版的伊丽丝是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是她的生命，她创作了《萨蒂亚》，“意思是礼仪和规则。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要遵循规则的，它们可以是神秘的、宇宙的或者数学的”（7）。然而，伊丽丝的行为却逾越了常规，她遵守礼仪和规则的音乐创作成为一种反讽，使丝丽伊对“人造人”行为愤然斥责：“你突破了常规——陈旧的人类发展。克隆婴儿就是突破常规的果实”（16）。众所周知，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事物都会产生问题。国外学者曾就“弗兰肯斯坦式”的恐慌对克隆术进行过探讨。美国著名生化学家、哲学家罗林教授指出：“克隆术与生俱来便是错误的，无论带来的结果是好或是坏……克隆术打破了道德秩序，即使它不带来任何坏处。这就像莱布尼兹的神学，没有克隆的世界才是上帝（或大自然）的本意……对于自然而言，人们必须清楚为何克隆是非自然的，剖腹产不属于非自然，为何非自然的就必定是不道德的”（Rollin 55）。克隆人的诞生跳跃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第一次选择，即生物性选择，违背了“自然选择”，进入了科学选择阶段。⁴ 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核心便是“自然选择”。⁵ 大自然在“选择”生物个体的生存与繁衍。每一个生命在诞生之前都会自然地、而非既定地去选择父母的基因，于是，孕育的过程充满着未知的神秘色彩，使生命富有自由与尊严。“生物科学一直关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命的起源与本质问题，另一个是生命是如何繁衍的”（韩松 39），克隆术针对这两个问题也向世人提出了探索的范围。

伊丽丝的生育过程无疑向世俗提出了挑战，也颠覆了女性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丝丽伊在日记中讽刺了这个高级的技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终于可以完全不依赖另一个性别。处男和处女可以生育了——多么了不起的进步！这是走向未来的第一步。但要当心！它有摔倒的危险，摔得发青，青得就像蓝图”（6）。从此，“蓝图”贯穿了“原版”与复制人的双重生活中，也贯穿了整部小说，表达了丝丽伊对超前科技的厌恶之情。克隆人是高度控制下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来说，克隆人是“无根的”非自然的产物，尽管他们具备“人形”，但却未经过“性选择”而诞生，所谓“性选择”则是自然界的另一种选择形式。⁶ 作为高等动物，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具有理性的伦理意识，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开始，人类便能辨善恶知羞耻。因此，不同于动物，人具有更高级的“性选择”，拥有基于伦理道德之上形成的“性选择”，即爱情和婚姻。丝丽伊的诞生是建立在无性生殖的基础上，即缺失两性爱情与婚姻的基础上，她对“原版”的母亲身份一直无法接受，并指责道：“你从来没有浪费过你的爱，没有对任何孩子和任何男人有过爱。你也不认识任何人，可以和你一起生育出一个你所希望的孩子。你不适合建立任何伴侣关系，而只适合建立克隆关系”（12）。上帝死了，人类自己成为了造物主，伊丽丝可以拒绝婚姻与两性而得到永生。

从传统家庭观念来看，我们无法确认伊丽丝和丝丽伊的血亲关系，毕竟“丝

丽伊”的命名只是一种复制的象征，而不具有任何伦理身份的概念。虽然伊丽莎白选择颠覆传统的生殖行为，很可能受到自己家庭的影响。她来自单亲家庭，没有父亲的生活对她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她认为没有父亲也能成长为优秀的人。然而，她的“单亲家庭”却和摹本的“单亲家庭”有着本质区别。早在费希尔克隆第一人的实验开始，他就遭到了各方质问。在社会舆论压力下，费希尔为自己的克隆术进行辩护，声称“一个克隆儿从一开始就缺少父母的一方，一个孩子从受孕时就没有父亲或母亲，这种说法并不能成为反对克隆的依据。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生活在所谓的单亲家庭中。克隆孩子的单亲家庭，只不过是提前到生命生成的起始而已”（64）。表面来看他说得很有道理，实则是一种诡辩。因为家庭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而克隆人从来就不拥有传统的核心家庭。丝丽伊从未有过父亲，而母版是否就是母亲，这一伦理身份尚不确定，因此人类的“单亲家庭”与克隆人的“单亲家庭”是两种概念，克隆人的诞生无疑开启了新型的家庭模式。

二、克隆人的伦理身份诉求

《我是克隆人》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它以完全不同的主体或完全不同的场景作为特征。丝丽伊对身份的追问，实际上是以奇怪和新意作为特征，暗示出新的技术、生物、哲学规范的可能性，陌生化了作者和读者的经验环境。“当代生物技术最大的威胁在于它可能会改变人性，从此将人类带到‘后人类’历史阶段”（Fukuyama 7）。颠覆传统生物性的选择是反自然的伦理越位行为，它产生了两个致命问题：一是伦理身份的不确定，二是人伦秩序的混乱。从小说章节来看，它实际上是以身份诉求为主线的伦理叙事，体现了丝丽伊整个人生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在叙事过程中，伦理身份诉求是伦理主线，这条线上又生出多个伦理结需要解构，包括对自我存在的疑惑、对双重生活的不满、对“母双”命令的违抗以及乱伦的伦理禁忌。

“我是谁”是困扰丝丽伊一生的俄狄浦斯式的问题。丝丽伊在斯芬克斯之谜面前，也急需解决“人形”与“人性”的本质区别。她面临的是所有克隆人都将面临的难题——“人是什么”，是与生俱来拥有尊严的生命体？还是由人工设计出的带有基因标签的碳水化合物？“人是由什么构成的，他的种族、才华或者个性都是如何形成的？”（98）从生物学角度看，她已拥有人形；从生产方式看，她是非自然的生殖产物。国内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认为，克隆人包括在机器人、人造人范围之内，而这些“人”正是人类自身的一种镜像。⁷因此，丝丽伊的身份诉求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永恒的追问，即关于“人”的问题，标志着她自我意识复苏和追求人性的开始。

但是，由于克隆人身份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丝丽伊对身份感到迷茫，时常找不到自我，内心孤寂而矛盾，她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自己是否有生命：“我今天在自问——我确实存在吗？我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个体？或者，我们这些克隆人连和黑猩猩都无法相比吗？”（37）著名的镜中实验证明黑猩猩也有

自我意识，而丝丽伊的人生还不如动物，从童年开始就循环于“我——你——我们”的双重生活中。“我如何才能够找到我自己呢？如果我在寻觅中只是一再碰到你，碰到你的图像，你——我的图像呢？不论我干什么，你总是走在我的前面，什么都比我干的更快，干的更好。我只不过是你的生命，再一个生命”（73）。丝丽伊对人生的质问回到了人类古老的命题，即人的本体论问题，这主要源自人类自身对于意义的焦虑：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来看，人真实的存在是指精神的存在，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失去自我，即‘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感’，往往导致心理上的焦虑、绝望、恐惧、病态”（黄文贵，15）。可以说，自我的诉求是构建伦理关系的基础，只有确立和完成自我建构，才能为个体与他人、社会建立伦理关系做好准备。丝丽伊曾为自己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发出绝望的声音：“我在诞生时，没有像其他婴儿那样用大声的哭喊渴求我的自由。因为，我的渴求早已被伊丽丝驱走”（26）。由于自我意识的缺失，丝丽伊决定通过叛逆来反抗伊丽丝的独裁，通过叛逆来找回自信、脱离伊丽丝的阴影。她故意养猫把家里弄脏；十二岁与伊丽丝同台演出时，在伊丽丝喜爱的呆板的黑色礼服腰间缠上黄色绸带以此示威；十四岁时第一次化妆、穿高跟鞋；青春期剪了短发并染发；离家出走。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她对自由的渴望，希冀找回个性。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成长过程与千万少年儿童一样，在青春期都会叛逆、渴望独立。“离家出走”是寻找自我的起点，是挑战“家长”权威的极端行为，只有摆脱伊丽丝的束缚，方可获得个人自由。可见，丝丽伊努力挣脱克隆人的身份，不愿复制生命和人生。只有解开“人”的身份的伦理结，才能拥有最终的存在感和人生意义。

然而，伦理身份的诉求是最难解开的伦理结。即使伊丽丝坚持认为丝丽伊是女儿，但丝丽伊却意识到这种反传统的血亲关系实则导致了人伦定位不清，她常要独自面对伦理困惑，一方面，困惑来自母版伊丽丝，丝丽伊认为母版实际上“把丈夫和妻子，母亲、父亲和姐姐集于一身”（18）。从生育角度来看，她们的“血亲关系”应当是母亲与女儿，因为双胞胎均为同龄，不可能是两代人。从孪生儿遗传角度来看，她们具有同样的基因密码，从骨骼、外貌到脑电图几乎一致，丝丽伊同时又把伊丽丝当做孪生姐姐，只是比自己早出生了一代人。丝丽伊经常想到关于双胞胎的古老神话，以此比喻自己的命运。“在古老的神话中，孪生儿的父亲不是神灵就是恶魔，而孪生儿的母亲则常常是不忠诚的女人或者是着了魔的女人，要不就是占卜女巫。因为，人类一向认为，孪生儿的诞生总是一种特殊的昭示：是预告幸运或者灾难的超自然的信号”（13）。所以，从出生开始，具有双重身份的丝丽伊注定会经历重重灾难。

伦理身份的混乱一直伴随着丝丽伊，直到八岁时，她发明了一个听起来荒唐的词语：“母双”——母亲双胞胎（58），这正是滥用科技的伦理后果。另

一方面，伦理身份的困惑来自于伊丽丝的母亲卡塔琳娜。早在丝丽伊五岁时，卡塔琳娜就无法接受这个小“魔鬼”（43），这种陌生的疏离感不仅能让人产生恐惧，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和情感上带来的震撼。在这位“长辈”眼中，小丝丽伊成为他者、异己的怪物，同时，也加深了自然人自己伦理身份的困惑：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三十六岁的伊丽丝，一个是五岁的丝丽伊。“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她就应该是两个人的母亲，而她已经去世的丈夫则不仅是伊丽丝的，而且也是丝丽伊的父亲。一个他死后才出生的女儿的父亲！这个想法使卡塔琳娜感到眩晕”（43）。对于丝丽伊来说，卡塔琳娜又是谁？是她的外婆，还是她的母亲？她无法选择正确的称呼，而在她听到“外婆”叫她“魔鬼”时，她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了阴影。

虽然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性使丝丽伊陷入伦理困惑，但是作为克隆的“人”，她经历了生物性选择的高级阶段——科学选择之后，仍要求归属于人类，得到自我承认和人类承认，这就必须进一步进化为人，拥有伦理意识、进行伦理选择。因此，努力成人的过程中，只有进行伦理选择，才是她真正解答“我是谁”的问题。青春期的丝丽伊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已经具有成年人的伦理意识。但是她的伦理选择既为了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为了报复伊丽丝，这就使丝丽伊在伦理选择中更多地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本能要求，即自由意志。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斯芬克斯因子”，体内既有人性因子，又有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人头体现的。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相对，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动物性本能完全凭借本能选择，原欲是动物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 21）。兽性因子要求人具有本能欲望，本能就要追求绝对的自由，实现自由意志，才能最终明确伦理身份。在兽性因子的牵引下，丝丽伊开始寻求属于一个少女的性爱自由。

就在丝丽伊十四岁时，她爱上了伊丽丝的爱人克里斯蒂安——名义上的“代理父亲”（76）。这次初恋对她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能体验真正的人类情感；二是达到报复伊丽丝的目的，成为她的情敌，使之嫉妒。虽然丝丽伊诱惑克里斯蒂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激怒伊丽丝，但是作为“复制品”，“伊丽丝喜欢的东西，丝丽伊当然也是喜欢的。一颗心和一个灵魂”（95）。丝丽伊付出真爱的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实际上，她的爱情很有可能出于“恋父情结”，由于缺少父爱，她在童年时代就认保姆的儿子雅内为“哥哥”，凡事依赖于他，一辈子形影不离；少女时代又爱上名义上的父亲，痛苦与快乐并存。快乐是因为兽性因子让欲望得以释放，让精神足够解放。享受爱情的丝丽伊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是的自我存在。同时，她成为伊丽丝的情敌，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跳出原来被束缚的生命，感到无比快乐。

但是，由于身份混乱意识的牵绊，丝丽伊在伦理选择过程中出现了伦理两难。一方面，她任凭自由意志牵引着自己，通过反叛来追求自我、激怒情敌；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安的亲昵动作激发出丝丽伊的人性因子，使她的理性意志及时

控制自由意志，使她因乱伦的羞耻感而退出这场爱情游戏。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混乱的伦理环境，伦理混乱导致了乱伦，乱伦又进一步加剧了伦理混乱。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密切相关，无论从“母女”角度还是“双胞胎”角度，克里斯蒂安与伊丽丝和丝丽伊的恋爱都是乱伦之恋，是任何家庭不容许存在的。乱伦不仅是被禁止的，而且被当作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乱伦禁忌也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社会科学的研究证明，古代人类的道德观念产生之前，伦理秩序是凭借禁忌维系的。以性关系为例，人们对乱伦关系极度恐慌，对乱伦的禁止也十分严厉”（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23）。可见，丝丽伊在伦理诉求中的抗争被头脑中的理性驯服，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的伦理意识与选择。

丝丽伊向善的道德要求在另一次伦理选择中体现出来，经历了乱伦事件后，她在日记中记录了十六岁时酒后乱性的经历：“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睡觉，是雅内的一个朋友，比我大十岁，我感到很轻松和美好，但我却没有爱上他。这只是我要完成的一项任务。和其他事情一样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至少是我的观点——我也完成了”（108）。然而，这次性放纵的目的是丝丽伊为了证明自己拥有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一次自我回归的体验，“那些该死的基因：让它们见鬼去吧！”（107）这个性行为并没有使丝丽伊更加快乐，反而加剧了她内心的矛盾。在任凭本能释放后，丝丽伊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再次交锋对抗，她没有丧失伦理意识，深知追求自由并不等同于性解放，这不是人类真正的自由意志。道德羞耻感让她产生了顿悟，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自由的意志也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夜里，我们就失去了对它的控制”（108）。

在伦理困境面前丝丽伊表现出对生命与道德的忧虑，她再也没有任凭原欲泛滥，而是让理性意志严格控制着自由意志。可见，丝丽伊的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便是伦理选择，这也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她深知伦理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力，深知逾越伦理禁忌会带来伦理恐慌。人类拥有“人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能够分别善恶是非，才可为人。而克隆人丝丽伊完成伦理选择后，也就意味着真正成人，人类也应当承认她作为“人”的身份。

三、人类社会前景与道德反思

小说最后，由于强大的遗传基因，丝丽伊也难逃厄运，同样患有致命的疾病。而造物主伊丽丝病重去世的那一刻，丝丽伊才算真正的解脱。那么，小说的核心是否只是描写丝丽伊作为克隆人的特殊生活？如果要探究丝丽伊的悲剧性，还应重新回到小说标题“蓝图”，发掘隐藏在其背后的寓意。“蓝图”本指设计出来的图纸，要晒成蓝色。晒图就是在透明的纸张上把设计图样描下来，然后去晒图机上用药水把它复制到纸张上，这样就可以复制很多张。诚然，克隆人丝丽伊如同晒图原理，她的诞生改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可以用基因干预的复制技术去制造人类。

丝丽伊到底复制了 DNA，还是复制了人？丝丽伊的人生在自我与复制的双重人生中轮回，她拥有生物 DNA 和信息 DNA，即拥有高级的生物性选择结果和人类的伦理意识，这两大因素使她在“存在”与“迷失”中徘徊，时而清醒，时而困惑，“存在两次，听起来总是有点荒谬，就像是我”（100）。有学者认为“克隆技术给人类的生死问题带来了一种新的解决途径，比较而言，它似乎更接近于中国古代道教的理念，是此‘生’之永生的某种程度的实现”（王晨 10），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理论上而言，道家思想首先是尊重生命和自然规律的。自然人与克隆人的关系就是“原版”与“摹本”的关系，正如伊丽丝和丝丽伊一样，她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生命、不同的自我意识，并且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还能造就不同的性格。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可以被重复制造的，并且人生还包括精神和意识，这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遗传密码。

有学者认为，克隆是自恋的表现，“克隆人被当做个人与自我关系的象征，是一种自恋”（Ferreira 44），克隆人为“原版”提供了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可以完成他在现实生活中未完成的梦想与愿望。因此，作为“原版”的伊丽丝不仅将 DNA 复制到下一代，也将她的才华和天赋复制到下一代，她与克隆人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如果将那个“斯芬克斯之谜”放置于自然人与克隆人共存的社会语境之下，我们很难分清自然人与克隆人之间的界限。丝丽伊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人性并无明显区别，他们在伦理选择与道德诉求中甚至形成鲜明对比。丝丽伊的身份诉求无论表现为抗争或是同化，她已然具备人类的理性；相反，与其说伊丽丝与费希尔医生成为了造人的“上帝”，不如说他们才是失去理性头脑的怪物。他们突破了人类认知底线，“人造人”已经跳出传统道德的藩篱，动摇了人类的价值根源。这幅“蓝图”体现了科幻小说的重要功能：“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个分支，主要反映在一个想象的未来、虚构的现实或过去中，被改造了的科技或者社会制度对人类产生的可能影响”（转引自吴岩 10）。

丝丽伊的身份诉求过程实则书写了一部打破复制蓝图的成长史，也是一部克隆术的伦理启示录。它迫切要求人类在科学选择时代到来之际，重新建构伦理体系与道德规范。纵观人类历史进程，几乎每一次社会转型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伦理道德的变化，甚至是颠覆性、毁灭性的改变。科学选择时代的理性绝对不是建立在生物基因之上，如果一味地追求欲望与目的，就会形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正如丝丽伊在解开伦理结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的滥用科技引发的伦理危机与恐慌。一方面，科技发展加剧了人类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和运用；另一方面，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追求人类自由、平等、权利、尊严等普适性的价值理性也日益重要。当工具理性恶性膨胀后，势必会破坏人类的价值和道义，甚至导致人类的灭亡。“克隆人永远生活在危机之中”（110），这是丝丽伊的呐喊和控诉，但是，与其说克隆人生活在危机之中，不如说人类生活在危机之中。丝丽伊与伊丽丝的故事警告人类：复制将使人找不到原版与摹本，“我”的主体性逐渐消失，成为语言符号而已，人类将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个人与他人的真实联系。

因此，小说的英文标题“Blueprint”便具有更深层的伦理寓意。“蓝图”的另一意义是指美好的蓝图，即希望与前景。如果把“复制”与“前景”两种意义结合，便形成一种反讽，克隆术确实是一种复制技术，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但前景并不美好。丝丽伊饱受精神压抑后，再次失去自我，发出了最后的感叹：“蓝图是忠于原件的。因为蓝色是悲伤的颜色。有一种蓝色的小花叫做勿忘我。永远勿忘我！否则你就会死去，我的生命！”（118）对生命的呼喊向世人发出警示：“道德通过对主体使用现代技术的目的及其手段的价值规导，使技术的使用合乎人性，合乎人的目的，为人类造福”（高兆明，孙慕义 188）。让人类理性地对待科技，理性地运用科技，不可超越“人是目的”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注解【Notes】

1. 参 见 Haraway, Donna. *The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o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enny Wolmark,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参 见 Fukuyama, Francis.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Saint Martin's Press Inc., 2003.
3. 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我是克隆人》，夏洛特·克纳著，王泰智 沈惠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
4. 关于“生物性选择”和“科学选择”的观点，详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6-17。聂教授认为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考察人类，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从猿到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作出的第一次选择，然而这只是一次生物性选择。这次选择最大成功就在于人获得了人的形势，即人的外形，从而使人类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而人兽区分的本质在于，人能分别善恶是非，具有理性，即伦理意识，因此伦理选择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选择。现阶段人类正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人类现在与未来都处于科学选择时代。
5. “自然选择指由于物种个体之间基因组成的差异，个体的生存能力与繁殖能力不同，于是，随着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一些个体能繁殖较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个体则不能繁殖戴很少繁殖”（《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性选择》《科学中国人》2002 年第 6 期）。
6. “生物的本能使个体采用各种各样的繁殖计策来扩散自身的基因。动物的繁殖行为是自然选择的中心。当自然界一种性别动物个体竞争异性个体戴异性个体产生的配子时，当一种性别动物个体会挑选异性个体交配时，这时就会产生性选择”（《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性选择》《科学中国人》2002 年第 6 期）。
7. 详见吴岩主编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第 74 页，“在当代，科幻中的‘机器人’泛指一切‘人造人’。因此，在西方科幻小说中‘robot’一词出了只钢铁型的机器人（mechanical men）之外，还包括所谓的‘生物机器人’等用生化方式制造出来的‘robot’，甚至‘克隆人’也被包括在‘robot’当中……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是人类自身的一种镜像”。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Ferreira, Maria Aline Seabra. *I Am The Other: 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5.
- Fukuyama, Francis.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Saint Martin's Press Inc., 2003.
- Rollin, Bernard E. "Keeping up with the Cloneses: Issues in Human Cloning." *The Journal of Ethics*, Vol. 3, No. 1 (1999): 51-71.
- 韩松: 《人造人: 克隆术改变世界》,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7年。
[Han Song. *Artificial Human: Cloning Changes the World*. Beijing: China Personnel Ministry Publishing House, 1997.]
- 黄文贵: 《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3年。
[Huang Wengui. *The Existential Revelation--Sartre and His Works*. Haik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3.]
- 高兆明, 孙慕义: 《自由与善: 克隆人伦理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Gao Zhaoming, Sun Muyi. *Freedom and Morality: Ethical Study on Human Cloning*.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 聂珍钊自选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s: Nie Zhenzhao's Anthology*.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王晨, 黄庆, 滕文, 《从“夏娃”到克隆人: 生物克隆技术》,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年。
[Wang Chen, Huang Qing, Teng Wen. *From Eve to Human Cloning: Biological Cloning Technology*. Zhuhai: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吴岩: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年。
[Wu Yan. *Theory of Science Fi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8.]

责任编辑: 杨革新